

一、中共「十九大」與建構習近平思想

開南大學公共事務管理學系副教授張執中主稿

- 中共權力接班的特徵之一在於意識形態的繼承和建構；領導人就任後必須逐步連結個人路線與黨的理論，並統一黨內思想，也必須展現實際政績，經黨代表大會認證以確立其意識型態。
- 習近平思想理論建構已逐步到位，習的路線於「十九大」列入黨章應無疑義，後續發展值予關注。

今(2017)年10月18日中共將召開「十九大」，對外界而言，孫政才落馬、陳敏爾竄升，王岐山是否留任、常委會最終名單、「習近平思想」如何建構，都象徵「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習核心」以來，習近平的權力展現以及中共重回強人領導的格局。從近來中共官方文件與媒體不斷強調「一個國家、一個政黨」與領導核心的重要連結，也意味「十九大」後的旗幟路線與政策目標，都必須配合黨的「人格化」體現，也因此「習近平思想」提出的呼聲，也就顯得理所當然。

當前各界對於「習思想」之討論，主要在其稱謂、冠名與序列。依既有黨章之論述，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作為自己的行動指南」。因此無論是「習近平思想」或是「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寫入黨章，主要著眼於習是否超越江、胡？以及能否等同毛、鄧？冠名「習近平」不同於「三個代表」與「科學發展觀」歸屬於集體智慧結晶，凸顯核心地位；但「習思想」之序列，是延續「鄧」、「江」、「胡」，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第四個發展環節，還是鄧小平理論後的新階段，成為「毛思想」、「鄧理論」、「習思想」三個時期？兩者間如何整合與分期可以同時滿足歷史定位、不同時期集體智慧與習近平的「超凡」(Charisma)角色？除了領導人權威外，仍必須從理論內容與實踐成果來觀察。

（一）改革開放後的意識型態發展

回顧中共意識型態的發展，對外體現不僅是一種世界觀，也是一種解釋社會現實的動態體系。在意識型態的「目標」、「現狀」與「方針」三個變項中，核心領導人對現狀的界定，影響行動的速度與策略。改革開放以來，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脈絡下，鄧小平提出「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作為銜接中共「核心」（馬列主義與毛思想）與「實踐」意識形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中介，為中國大陸從共產社會道路「倒退」提供理論基礎，也使中共從革命理想朝世俗理性發展。江澤民「三個代表」為「資本家」與「私有財產」的存在，與中共在「市場經濟」環境下作為執政黨的角色，提供修憲與合法化依據。胡錦濤則以「科學發展觀」調整發展方向，以降低經濟發展過程中的失衡問題與社會矛盾，尋求永續經營。

由前述可知，中共透過意識形態的調整，為改革提供合法性與理論依據；但另一方面，長期以來圍繞著核心領導人的權力結構，黨內不能有兩種聲音是政局穩定的前提，亦使得接班人的「韜光養晦」成為常態，直到接班後掌握意識型態詮釋權才開始快速鋪陳個人路線。比如胡錦濤上任初期以「三個為民」（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繫，利為民所謀）來詮釋「三個代表」，轉而強調不能根據數字（如GDP）來決定發展方向，把「三個代表」給「科學發展觀化」，並在「十七大」將「科學發展觀」寫入黨章。而習近平在「十七大」進入常委會後，也只能在胡的理論脈絡下偶爾釋放個人觀點（包括2008年9月在中央黨校演講中提出「必須在實踐中形成堅強的中央領導集體」；2010年5月提出以「短」、「實」、「新」，取代「長」、「空」、「假」的黨建思路；以及同年10月以「權為民所賦」的權力觀，補充胡錦濤的「三個為民」）。

（二）習近平時期的意識型態建構

「十八大」在「薄案」與「紅歌」的餘煙下，鞏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旗幟與「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國情，習近平路線也開始組建。從提出「中國夢」、「新八項」、「深化改革」到「四個全面」，其目標就是「小康社會」與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包括2013年11月起，中共中央用半年時間，舉辦7期省部級幹部研討班學習習近平系列講話精神（中

國共產黨新聞網，2014.2.18)。隨著周永康落馬與「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深化改革」路線後，歷屆全會決定成為省部級研討班主題，並由習近平親自出席開班式講話，強化省級領導幹部的看齊意識。此外，2014年出版「習近平談治國理政」，收錄習近平執政一年半以來，涉及18個面向的79篇文章。同樣內容後續也在官方媒體如「新華網」、「人民網」設置「學習進行時」專頁，有系統地整理習近平在各領域的論述。2014年底，華中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石先鈺，在人民論壇發表「淺析習近平思想的基本特徵及指導意義」一文，除了主張確立「習近平思想」，更建議中共的指導思想表述改為「馬列主義、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及習近平思想」三個序列，引起外界關注（人民論壇網，2014.12.17）。

在此期間，習的權力在「小組政治」與「整風反腐」下更加鞏固，至「十八屆六中全會」確立「習核心」後，隨著「十九大」日程接近，「習思想」的宣傳也越顯熱絡，尤以「中辦」與「中組部」扮演重要的詮釋角色與推手。今年2月，中央辦公廳主任栗戰書在「中央直屬機關2017年黨的工作會議」講話中，首次提出習近平執政以來的新理念、思想與戰略已經初步形成完整的理論體系（包括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兩個百年」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經濟發展新常態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意識形態領域鬥爭和文化強國戰略，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打贏扶貧攻堅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嚴肅黨內政治生活，把黨建工作作為最大政績，總體國家安全觀，中國特色強軍之路等。中直黨建網，2017.3.14）。今年「兩會」結束前，國防大學軍隊建設研究所所長劉明福在倫敦「自由俱樂部」，高調出版新書「習近平思想」（鳳凰網，2017.3.29）。中央黨校校長劉雲山在5月開學典禮講話中，也提出習近平系列重要講話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新華網，2017.5.16）。7月，中組部主管的「黨建研究」雜誌，由編輯部發表「在黨的創新理論偉大旗幟下闊步前進」一文，文中明確提出「十八大以來的創新理論，也可稱之為習近平思想」，該文與前述栗戰書的講話相呼應，從八個面向（主題主線、主要任務、總體方略、發展理念、安全保障、外部環境、依靠力量、領導力量）概括「習思想」，並視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最新發展，是當代中國最鮮活的馬克思主義」（今日頭條，2017.7.15），而「馬克思主

義中國化最新成果」也成為建構「習思想」得以操作的槓桿。

（三）不同階段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值得關注的是，前述「黨建研究」一文對於「習近平思想」處理的主題與歷史序列都有較為明確的論述。一方面，從鄧小平到習近平四位領導人，都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範疇，鄧、江與胡時期分別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建設一個什麼樣的黨及怎樣建設黨」、「實現什麼樣的發展及怎樣實現發展」。而習時期則是回答「什麼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及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什麼樣的民族復興及怎樣實現民族復興」，將主題從國家層次提升到全球層次，與江、胡時期產生高低落差。

另一方面，在歷史序列上，類似前述石先鈺一文分為「馬列主義、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及習近平思想」三個時期，「黨建研究」一文則是以馬列主義作為意識型態核心，而將「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劃分三個階段（歷史性飛躍）。毛澤東思想是第一階段；鄧理論、三個代表與科學發展觀組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為第二階段；最後則以習近平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與處理的主題為第三階段。相較於鄧小平時期將毛澤東思想晉升為「核心」意識型態，習近平則是把「毛思想」拉回「實踐」意識型態與「鄧理論」同一位階，試圖解決本文一開頭所提的「超越」江胡與「等同」毛鄧之問題，並滿足歷史定位、不同時期集體智慧與習近平的「超凡」角色。

（四）結語

中共權力接班的特徵之一，在於意識形態的繼承和建構。除就任初期必須逐步連結個人路線與黨的理論、組織人事與未來工作，並統一黨內思想，也必須以實際政績的實踐成果，經過黨代表大會的認證以確立領導人的意識型態。自鄧小平以來，領導人在意識型態的「削減」與「保留」間的抉擇，決定於黨國特質、領導人權威、前期政治遺產，以及國家社會關係演化。

「以習近平為核心的黨中央」，確立了習自「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戰果，在中共黨內定於一尊，緊接著習的路線列入黨章也是鞏固核心角色的必要步驟。由於黨章是中共全黨共同遵守的準則，黨章修正除體現重大戰略思想，同時也具備規範組織與明確目標之功能。江澤民「三個代表」於「十六大」寫入黨章；胡錦濤「科學發展觀」於「十七大」寫入黨章。今年9月18日中央政治局會議，已決議提請「十八屆七中全會」討論「十九大」的黨章修正案（新華網，2017.9.18），因此習的路線於「十九大」進入黨章應無疑義。

習近平在今年「7.26」講話（7.26 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習近平總書記重要講話精神，迎接黨的十九大」專題研討班）中，除定位「十九大」為「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勝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關鍵時期的大會」，亦將5年政績與旗幟理論、小康目標與工作方針加以連貫。從前述各分口公開支持「習近平思想」，可以確認其理論建構已經逐步到位。問題在於，「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無論是司法體制改革、監察體制改革或供給側改革等都仍處於試點與進行階段。因此以「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三次飛躍來樹立「習近平思想」是完成式？還是從當前官方文件所提「習近平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過渡到「習近平思想」的進行式？

前述9月18日政治局會議決議中，提出「要把黨的十九大報告確立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戰略思想寫入黨章，使黨章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充分體現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仍未見「習近平思想」之文字。因此未來的發展可能呈現幾種可能：1.「習近平思想」一步到位；2.先將「習近平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定位為「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第三次飛躍，至「二十大」整合為「習近平思想」；3.延續既有「馬列、毛、鄧、三、科」論述後新增「習近平治國理政思想」，繼續對外宣傳「習近平思想」直至「二十大」寫入。儘管如此，習核心與黨的人格化特質將是「十九大」的重點，而「習近平思想」對中共黨史的重新定位，也讓習在「二十大」的影響力有延續的空間。

二、近期中共加強取締非法傳銷組織之觀察

國立政治大學東亞研究所教授兼所長王信賢主稿

- 近期中國大陸傳銷組織「善心匯」在北京動員逾 6 萬人示威，及大學生誤入傳銷組織死亡等事件，使相關社會問題再度引發關注，傳銷組織強大的跨域動員力更觸動官方維穩敏感神經。
- 中國大陸過去已有打擊非法傳銷措施，近期因應「十九大」加強整治。惟非法傳銷在合法掩護、形式翻新、地方政府包庇，及中國大陸之社會結構與價值觀下，恐不易禁絕。

（一）前言：從近期兩個社會事件說起

近期中國大陸發生數起非法傳銷活動及投資詐騙事件，不僅引發網民熱烈討論，也震撼了官方，其中以今（2017）年 7 月底的「善心匯事件」最引人矚目，此一事件起因於 7 月初「善心匯」被中國大陸公安部定性為傳銷組織，並拘捕創辦人張天明與高階幹部，資金也被凍結，投資者因不甘損失而走上街頭，請求中央政府「主持公道」、還「善心匯」清白，並要求釋放張天明等人。7 月 21 日起，來自各地「善心匯」投資者接連數日在北京的國家信訪局、中紀委大樓、天安門廣場、最高人民檢察院與大紅門國際會展中心等地發動「愛國」示威，甚至出現逾 6 萬示威群眾，被媒體稱為是繼 1999 年「四二五」法輪功上訪事件以來，北京最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北京當局動員大批警力驅離，並逮捕 63 名「帶頭滋事份子」。

除此之外，8 月初也陸續傳出 3 名大學在學或畢業生誤入傳銷組織而死亡的消息，引起中國大陸社會震驚，許多人因而對求職陷阱感到擔憂。中國大陸東北大學畢業生李文星、內蒙古科技大學畢業生張超，兩人於 7 月透過網路招聘平臺找工作，卻被誘騙進傳銷組織，先後被發現因不明原因死於天津。根據警方調查，李文星死亡的背後涉及一個運作長達 11 年、規模龐大，名為「蝶貝蕾」的老牌傳銷組織。天津市警方依據線索，逮捕 5 名「蝶貝蕾」高層涉案人員。鑒於傳銷組織猖獗與囂張行徑，天津市當

局展開打擊取締非法傳銷的專項行動，誓言 20 天內徹底清除天津市非法傳銷活動，「打不淨，不罷手、不收兵」。此外，湖北省鍾祥市也傳出有一名 20 歲女大學生林華蓉，因落入傳銷組織陷阱，不堪組織軟禁而跳河自盡的悲劇。此類情事在過去十多年來屢見不鮮，不僅衍生出社會問題，也成為官方「維穩」的壓力來源。

（二）傳銷在中國大陸發展情形

「傳銷」擁有「層壓式」、「多層次」的特質，其基本邏輯是「以後一輪入會者的投資作為前一輪會員的收益」，才能夠有如此高昂的報酬率，而成員也因此有極大的誘因發展「下線」。1989 年傳銷從日本開始傳入廣東等地，而 1990 年代隨著美國雅芳公司將直銷模式帶入中國大陸後，「多層次銷售」才開始大量湧現。然而，從中國大陸官方角度而言，「傳銷」不僅對個人與家庭財務有所危害，也會導致社會中人際信任程度降低，甚至衍生出偷竊、搶劫等犯罪，及造成非法集資、販賣偽劣商品、逃漏稅等問題，不利社會穩定。

由於傳銷是種連鎖式的銷售方式，在中國大陸散布極快，根據號稱「中國反傳銷第一人」李旭所創建的「中國民間反傳銷協會」曾公布的「中國傳銷分布圖」，中國大陸各地都已被各類傳銷組織「攻陷」，其中，上海、青海、新疆、西藏為「輕微受災區」，「重災區」則有廣西、安徽、河北、湖北、湖南、江蘇、四川等。今年 4 月，中國大陸某社交平臺發布一份「全國傳銷高發地圖」，根據地圖顯示，中國大陸有 30 個城市被列為「傳銷高發地」，其中又以廣西上榜的城市數量最多，包括防城港、桂林、北海、桂林、南寧、貴港等 6 個城市，占總數的五分之一。此外，傳銷也分南、北派，北派發源於東北一帶，後傳入河北、天津、山東等地，後來逐漸擴散至其他地方；南派傳銷發源於廣西，後來蔓延到雲南、貴州、四川、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而在傳銷形式上，北派多靠暴力控制、限制人身自由，前述「蝶貝蕾」即屬北派；南派則多靠精神控制，打著「網絡營銷」與「人際網絡」等，其中「善心匯」就屬於南派。經過十餘年的演變，兩派在各地多已合流。

就此而言，不論是中國大陸官方所評估傳銷對個人、家庭、社會所造成的危害，或傳銷組織在中國大陸的廣布，亦或是其運作所帶來的潛在社會動員力量，都將給中國大陸政府造成「維穩」的壓力。因此，一開始「傳銷」在中國大陸就屬非法行為，中央也分別在 1994 年由國家工商管理局發出「關於制止多層次傳銷活動違法行為的通告」以及「關於查處多層次傳銷活動中違法行為的通知」，2005 年國務院公布「禁止傳銷條例」，甚至在 2009 年「刑法」修正案也將「傳銷」等相關銷售方式納入規範。

（三）中共「十九大」前加強取締措施與維穩

由於當前正值「十九大」前高層權力分配的敏感期，任何危及社會穩定的事件必然受到各方高度重視，更何況是前述引發數萬人聚集的「善心匯」事件，或是「李文星」事件所造成的網路輿論帶來之維穩壓力。因此，為替「十九大」營造穩定良好的社會環境，以及緩解近來幾起事件引發之民怨，近期中共國家工商總局、教育部、公安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四部門印發「關於開展以『招聘、介紹工作』為名從事傳銷活動專項整治工作的通知」，展開為期 3 個月（8 月 15 日-11 月 15 日）的傳銷活動專項整治行動，要求「嚴厲打擊、依法取締傳銷組織」、「加強對重點招聘平臺的排查」及「加強對人民群眾的宣傳教育」。

事實上，中共當局打擊傳銷活動工作並非一朝一夕，四部門聯合發布「通知」，只是更展現當局出「重拳」宣示打擊傳銷活動的決心。中國大陸各地方政府每年度均編有打擊傳銷專項活動，現今在中央的關注下，其執行力度勢必更加強化。除前述提及天津的打擊行動之外，例如 8 月底廣西北海市出動 2,100 名軍警，大舉掃蕩傳銷組織，即因規模空前而引發關注；北海市委書記王乃學受訪時更表示，傳銷是「經濟邪教」，一定要重拳打擊，將傳銷掃出北海。換言之，就中共當局而言，「傳銷」不僅是經濟問題，更攸關社會穩定。

（四）傳銷在中國大陸屢禁不絕

然而，為何已經將「傳銷」列為「維穩」的目標，各部門也聯手出「組

合拳」、地方政府也對傳銷組織出重手，為何傳銷還是屢禁不絕，且「越維越不穩」？首先，從傳銷的技術來看，中國大陸幅員廣大，而傳銷活動發展成本低廉，即便遭到查緝，也容易捲土重來，因此不易禁絕。此外，「傳銷」也因為網路的發展和金融便利性提升而出現變異、變形，其中包括消費返利型、遊戲理財型、互助理財型、微商傳銷、金融傳銷（虛擬貨幣，原始股）等，隱蔽性更強，更難以辨別。而前述 2005 年所通過的「直銷管理條例」和「禁止傳銷條例」等，皆無法有效應對近年來興起的如「網路直銷」、「微商」等新興傳銷方式，中國大陸史上最大金融傳銷騙局——「e 租寶」即為一顯例，其在一年半內非法集資逾 500 億元人民幣，90 萬受害投資人遍布中國大陸 31 個省市區。

其次，是地方政府的角色，部分傳銷組織往往和地方政府相互勾結，甚至有些傳銷組織能夠得到政府部門和宣傳機構為其站臺，騙取民眾的信任，地方政府表面上宣示「反傳銷」，但實際上，部分地方政府為求經濟政績，甚至成為其中的利益共同體，如「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詐騙案」即是如此。泛亞有色金屬交易所是一家由雲南地方政府發起、批准成立的稀有金屬交易平臺，宣稱其理財產品能夠獲取高收益，但該公司於 2015 年 4 月陷入兌付危機，最後董事長單九良等 16 名主要犯罪嫌疑人，因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犯罪而被捕。前述提及的傳銷組織「善心匯」，中央電視臺也曾為其宣傳。

再者，部分傳銷組織是「合法掩護非法」或是遊走在監管部門「互不管」的縫隙中。就前者而言，「蝶貝蕾」即是一例，從 2005 年開始，「蝶貝蕾」與其他組織開始加盟貴州虹躍集團的一家下屬公司——貴州虹躍藥業有限公司，透過此「合法」外衣從事傳銷。就後者而言，許多傳銷組織根本不登記註冊，因為既非實體公司也無產品，工商部門難以監管，而公安機關一般也不會在案件爆發前介入調查或處置，使其得以在此「縫隙」中大量開展組織活動。

最後，近年來傳銷組織所用的「語彙」幾乎完全配合「政府政策」，以降低民眾的戒心。如「地方政府暗中支持傳銷」是傳銷者給「新入行者」的第一堂課，且經常號稱「政府支持」、「民間互助理財」，甚至有些打著

「西部開發」、「北部灣開發」、「中部崛起」等旗號，以考察項目、包工程為名吸引「下線」。而前述「善心匯」即是標榜近年來習近平所特別強調的「精準扶貧」，吸引中下階層、身心障礙人士投入。換言之，打著中央政策名義「護體」，是其得以壯大的原因之一。

（五）結語

整體而言，中國大陸官方之所以將「傳銷」視為非法，最關鍵還是在於其不利於社會穩定，特別是此類組織不明顯，但卻有極為強大的動員能力，其投入的會員在利益的號召下，可以在短時間迅速動員人群，如「善心匯」事件竟可在「維穩」程度最高、部署最密集的北京，動員、集結超過6萬人。此外，過往中國大陸社會抗爭的主要特點是少有跨區域、跨階級的事件，但由「傳銷」所引發的抗爭往往具有跨區域與跨階級的「實力」，這也是為何官方會下重手的主因。

持平而論，中國大陸「傳銷」與「反傳銷」所凸顯的仍是社會結構與價值觀的問題。前述的李文星等大學在學或畢業生誤入傳銷組織而死亡的消息，顯示出龐大就業壓力是非法傳銷有縫可鑽的前提。而傳銷活動盛行更為深層的因素，則是高速的經濟發展與社會轉型，意識形態真空而缺乏社會規範，客觀上形成「唯利是圖」的社會價值觀，使人變得毫無顧忌和敬畏，為了賺錢不擇手段。就此而言，過去高速經濟發展所帶來的後遺症，如今逐一發作，這絕非中共官方強力推動「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可以解決的，而是需要一個漫長的社會價值重塑的過程。

三、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大陸對北韓政策觀察

兩岸交流遠景基金會執行長賴怡忠主稿

- **北韓核武與導彈發展在近年出現長足進步，北京雖不同意北韓擁核，但未努力遏止其武力升級，且對南韓部署薩德系統嚴厲反對，徒增外界「中國大陸保護北韓核武發展」之負面印象。**
- **北韓與北京關係日益冷淡，並開始轉向俄羅斯；另北韓核問題也增加美、日、南韓緊密合作的正當性。此一局勢發展使得中國大陸不再是北韓核問題的主要議程設定者，並增加中國大陸與美、日、南韓矛盾，流失東北亞情勢主動權。**
- **「十九大」後中共對北韓政策應不會脫離「不戰、不核、不亂」、「韓半島核武器不發展、不引入、不部署」、「雙暫停」、「棄核與韓半島停和機制雙軌同步進行」等過去主張，將增加與美日韓同盟及美中之間的矛盾。**

北韓問題從 2016 年初北韓第 4 次核武試爆後，情勢急轉直下。從 2016 年初至今，北韓展開 3 次核武試爆，每一次的威力都較前次更大，且間隔時間更短，顯示北韓核武裝置藏量與技術精進已臻相當程度。北韓的導彈試射也從過去主要是政治威嚇性質，轉變為具實體威脅的能力測試，不僅距離更遠，準確度也大為提高，2017 年 3 月的測試甚至顯示北韓意在測試其對日本的同步飽和攻擊能力。8 月底與 9 月初的兩次導彈測試，其飛行距離都超過 2,700 公里，已經屬於比中程距離更遠，次於洲際彈道飛彈的遠程彈道飛彈測試。而且這兩次都是直接飛越日本上空，挑釁意味極為濃厚。美國強調對北韓問題不會排除軍事選項，北韓也不甘示弱表示必將給予美軍迎頭痛擊。

隨著北韓問題日趨嚴重，作為北韓海外最大貿易來源，以及肩負北韓糧食補給最大國家的中國大陸，被認為必須要對北韓挑釁作為負起壓制的責任。美國總統川普不只一次公開要求中國大陸須對北韓施加更大壓力，

媒體也報導川普對中國大陸在北韓問題的作為並不滿意。但中國大陸除反對北韓核爆外，還是強調北韓問題只能以和平方式解決，對於聯合國內部有關對北韓的經濟制裁提案也多所保留，甚至努力淡化其範疇與強度，但對於受北韓飛彈威脅而有意部署薩德（THAAD）飛彈防禦系統的南韓，中國大陸卻強力施壓，降低赴韓旅客人數，抵制在中國大陸的樂天等韓國賣場。北京對北韓多所忍讓，但對受威脅南韓的作為卻強悍施壓，這種種作為增加外界「中國在保護北韓核武發展」的負面印象。

（一）北韓核武與導彈發展在習近平主政時代出現長足進步

北韓核武問題與飛彈問題雖然已經存在了 20 多年的歷史，但卻是在 2012 年習近平上臺後，出現急速惡化。金正恩在 2011 年底接班，於 2012 年 2 月底與美方簽署「閏日協定 Leap Day Agreement」，但在 4 月的衛星發射遭聯合國抵制後，北韓退出「閏日協定」，並在 2013 年進行第 3 次核試驗，接著在 2016 年初與同年 9 月，分別展開第 4 次與第 5 次核試爆，其 2016 年初的核試爆更宣稱是氫彈試驗。今（2017）年 9 月 6 日的第 6 次核試爆被認為是規模最大，威力與美俄核彈相比毫不遜色，也是技術最成熟的核試驗。

北韓在 2012 年進行「衛星發射測試」，其在 2013-2014 年的飛彈測試多屬於地面發射的短程飛彈（飛毛腿家族飛彈）。這個情形在 2015 年出現變化，北韓在當年 5 月首次成功測試其潛射飛彈（北極星系列，SLBM），2016 年 4 月開始測試遠程彈道飛彈（IRBM，舞水端飛彈），之後也出現使用固體燃料以推進火箭的發展。2017 年 5 月北韓成功試射射程可達關島的遠程彈道飛彈（火星 12 號），並在 7 月宣稱射程可打到美國本土的洲際飛彈（ICBM，火星 14 號）測試成功。北韓在 2017 年 8 月 29 日與 9 月 15 日測試成功的都是火星 12 號遠程彈道飛彈，其軌跡都飛越日本上空，射程可抵關島，形成最新挑釁。

北韓核武與導彈發展是在金正恩上臺後急速進步，但主要的發展是集中在 2012 年習近平上臺以後。這不一定表示習近平在包庇北韓或資助北韓的武力發展，但在北韓核武與飛彈能力出現快速飛越的時候，北京沒因為核武與導彈危機的升級而付出相對努力遏止，確是事實。

（二）習近平時代的中國大陸與北韓關係日益冷淡

中國大陸與北韓有同盟關係（中朝友好互助合作條約），過去還被形容是唇亡齒寒的血盟關係。北韓將中國大陸與美國勢力隔開，使北京不會直接面對美國以及美國在東北亞的同盟勢力，因此是中國大陸很重要的戰略緩衝。不論是金日成或是金正日都訪問過中國大陸，但是金正恩上臺後至今沒去過中國大陸。媒體傳說金正恩認為自己是北韓王朝的嫡系，在共產國家系譜的位階高於只是紅二代的習近平，金正恩自己還有留歐經驗（先前在瑞士念書），比起文革時被下放農村的習近平更具國際視野。也有消息傳出習近平非常看不起 30 歲不到的金正恩，認為是個生性魯莽、只會給中國大陸惹麻煩的傢伙。

而北韓幾次核武與飛彈測試，其時間不少與中國大陸的重要節慶有關，例如第 4 次核試爆，感覺是針對習近平在前年 9 月向當時的南韓總統朴槿惠承諾會處理北韓核武之反制，第 5 次核試驗則剛好是毛澤東逝世 40 周年，以及中國大陸剛結束其在杭州舉辦的 G-20 峰會時。北韓舉行第 6 次核試驗的時間，恰巧就是習近平在廈門主持金磚峰會的時刻。這些時間點的選擇，讓人感覺到金正恩有向中國大陸示威的味道。

但北京與北韓關係日益冷淡，不一定表示北京就更願意對北韓核武及飛彈問題採強硬立場，日前聯合國決議案被中俄聯手淡化即一例。總結來說，北京對北韓議題的態度是現實主義掛帥，與個人對金正恩的好惡關係不大。

（三）中國大陸認為北韓核問題是美國與北韓雙邊議題，中國大陸是應美要求協處

基本上，中國大陸認為北韓核武與導彈問題是美國與北韓的雙邊爭議，中國大陸只是應美國要求協助處理。中國大陸一向認為重啟六方會談才是解決之道（日本則因 2008 年初被突襲的經驗，對六方會談始終忌憚在心），也認為美國與北韓展開雙邊對談才能解決問題。北京雖然主張要展開六方會談，但不認為重啟六方會談或是美國與北韓展開對話等，須以北韓承諾棄核為前提。北京也提出其一貫立場是「無戰、無核、無亂」的「三無政策」，對於核武

則是「韓半島不發展、不引入、不部署」(意即在南北韓的土地上都不能有核武)，也認為「非核與韓半島停和機制同步進行」，不認為非核是韓半島停和機制的前提。中方更不把日本被北韓綁架的人質問題當一回事，認為這只是給六方會談失焦的無意義要求。當中方把北韓核武當成別人的事，自己只是負責調停的第三者，不認為本身是當事人，再看看北京不把非核承諾作為展開對話的前提，可看出北京對六方會談的立場以及對北韓問題的態度，與美日韓明顯不同。

(四) 中國大陸不同意北韓擁核，但對南韓部署薩德系統反對更嚴厲

中國大陸的立場是韓半島無核化，並進一步提出其核武在韓半島的立場是「不發展、不引入、不部署」，這意味對南北韓都適用。中國大陸固然不同意北韓擁有核武，但也同樣不同意南韓發展與引入核武、或是由其他國家在南韓部署核武。

但從 2016 年 1 月北韓試爆「助爆型核彈」後，中國大陸固然同意聯合國的制裁措施，但並沒有針對北韓核武發展有其他具體作為，當年 9 月北韓又再度核爆。反而南韓針對北韓核武與飛彈發展開始討論部署薩德飛彈防禦系統時，中國大陸對此表達強力反對，並以限制觀光客、對韓國輸中產品設限，甚至對可能部署薩德系統的樂天集團，抵制其在中國大陸的生意，導致業績一落千丈。

中國大陸對發展核武的北韓，以及其對為自保而部署飛彈防禦系統的南韓，對應強度差異明顯；與中國大陸不認定北韓是威脅，但卻高度擔心薩德系統會大幅削弱中國大陸飛彈的威嚇能力之認知有關。有趣的是，90 年代末期當日本因應北韓大浦洞飛彈而開始部署飛彈防禦系統時，中國大陸也強力反對，認為這會破壞東北亞軍力平衡，但當年中國大陸還不具對日本展開經濟戰的實力，中國大陸占日本對外貿易的比例也不像其占南韓對外貿易比例這樣高，相信這是當年日本開始部署反導系統後，在日中之間沒出現經濟抵制狀況的主因。

(五) 中國大陸利用北韓問題惡化要求美韓同盟降級

美國要求中國大陸必須對北韓核武問題採取更強硬措施，但中國大陸始終將北韓問題視為美國與北韓的雙邊爭議，主張北韓發展核武的動機與其受到美國的威脅有關，因此應由美國與北韓展開雙邊對話以增進互信來「減核」，並回到六方會談的框架下處理。但美國認為北韓違約在先，無法接受北韓在不承諾棄核前與北韓展開對話或六方會談。

隨著 2017 年川普上臺後，美國對北韓立場明顯強硬，也宣稱過去對北韓作為是失敗的，並公開表示不會排除對北韓動武的選項後，中國大陸提出新的主張-「雙暫停」，認為美韓同盟暫停軍演以換取北韓暫停其核試驗。中國大陸的「非核與韓半島停和機制同步進行」主張維持不變。這就是中國大陸的「雙暫停、雙軌」的韓半島核武政策。但這個政策為美國與南韓國防部所拒。

對美韓同盟來說，中國大陸此舉形同利用北韓核武危機來要求美韓同盟降級。由於美韓同盟是因應北韓對南韓的威脅而生，歷次演習都是處理如何應付北韓南侵，因此當中國大陸主張要拿美韓同盟演習的暫停來換北韓核武實驗的中止，形同北京要華府與首爾公開承認北韓核試驗有正當性，也是把一個沒有正當性的核武試驗與被聯合國背書的美韓同盟演習等價齊觀。美國也認為這是中國大陸把原先應該是自己要處理的問題丟出去，反向要求美韓同盟須為中國大陸對北韓的不作為付出代價。中國大陸這個提議使得美中關係變得更疏離，更特別使南韓軍方懷疑中國大陸對韓半島的戰略意圖。

(六) 中國大陸現逐漸流失東北亞情勢主動權，與當年主導六方會談時大異其趣

北韓核武與導彈發展的後續效果，是南韓對北韓態度日益強硬，使日本民間支持修改和平憲法的聲浪趨高；日相安倍有更多政治空間強化美日同盟，並促使其在 2015 年 9 月通過新安保法。美國也更能說服南韓強化與日本在安全議題的合作，以及美日韓的三方合作。李明博時代無法通過的 GSOMIA 在朴槿惠時代通過，即使當時（2016 年底）朴槿惠的支持率已降

至個位數。

而中國大陸對南韓部署薩德的強硬態度，讓原先相當支持中國大陸主張的南韓，與中國大陸關係日益疏遠。美國也屢次以北韓問題質問中國大陸，使美中關係出現有史以來最嚴重的爭論。而中國大陸受到壓力後對北韓所採取的作為，不論中國大陸淡化多少對北韓的制裁，也反向使北韓對北京更失望，再度降低中國大陸與北韓的互信。更有甚者，北韓擔心被中國大陸出賣後開始轉向俄羅斯，更讓已經退出韓半島數十年的俄羅斯找到插手東北亞的新機會，北韓與俄羅斯關係較與北京關係更為友善，俄羅斯勢力再度進入韓半島。

雖然北韓核問題發展對美日韓都形成挑戰，但也帶來美日韓緊密合作的正當性，並給日相安倍一個推進內部政治改革的外患保護傘；也讓美國從解決北韓問題的泥沼脫身，因為正是中國大陸長期主導北韓問題導致該問題的惡化。但另一方面，這個局勢的發展對中國大陸卻極為不利，當年中國大陸藉由主導六方會談來發展美中關係，甚至發展出要脅美國籌碼的情形已不復見。目前的發展使得中國大陸不再是北韓核問題設定議程的主要行為者。

（七）「十九大」後中國大陸之北韓政策動向

有一說認為，中共「十九大」開會在即，使中國大陸對外作為相對保守，因北京以維穩為主，全力放在安全過度「十九大」。這個邏輯也暗示當「十九大」結束後，北京可能對北韓議題採更積極的作為。

由於北京不太可能改變過去既有的政策與主張，因此「十九大」後的北京對北韓政策，應該不會脫離「無戰、無核、無亂」、「韓半島核武器不發展、不引入、不部署」、「雙暫停」、「棄核與韓半島停和機制雙軌同步進行」等過去主張。更重要的是，北京已經把北韓核武問題與美韓同盟的活動聯繫一起，也不認同以北韓棄核作為美與北韓和約前提的美方主張。這些立場的分歧，只會讓中國大陸與美韓同盟及美日同盟的矛盾持續增加，也給美中關係帶來新的負面因素。這些問題不會因北京對北韓議題採取若干積極性的戰術作為而被減消。

四、近期中印邊境衝突觀察

國立清華大學通識中心助理教授及印度中心副主任方天賜主稿

- 中國大陸與印度近期在洞朗地區發生對峙事件，是雙方 30 年來最嚴重的邊境衝突。北京為使金磚廈門會議順利舉行，最終同意與印度達成撤軍協議。
- 洞朗事件使中印更加猜忌及缺乏互信，將影響未來互動。雙方若未能達成具體的約束協議，類似事件不排除將重演。

（一）中印邊界衝突背景

中印雙方在 2017 年 6 月 18 日於中國大陸、印度、不丹交界的洞朗（印度稱都克蘭，Doklam）地區發生衝突，直到 8 月 28 日才告結束，成為繼 1987 年邊境衝突後最嚴重的邊界事件。

此次衝突的主因來自於印度派兵進入該地區阻止中國大陸建築道路。印方認為，該地區是中國大陸與不丹間的爭議地區，一旦中方在該地建築道路，將會改變現狀，也可能危及印度的西里古里（Siliguri）走廊安全。由於印度與不丹簽有「印不友誼條約」（India-Bhutan Friendship Treaty），印度認為它有理由介入。中方則認為，該段邊界已由 1890 年「中英會議藏印條約」所劃定，指責印軍違法進入中國領土。雙方對此互不相讓，形成對峙狀態。

面對此一僵局，印度呼籲兩國透過外交手段和平解決。中國大陸的立場則較為強硬，要求印度須先撤軍。中國大陸外交部並在 8 月 2 日發布「印度邊防部隊在中印邊界錫金段越界進入中國領土的事實和中國的立場」文件，闡述其立場及爭取國際輿論支持。為升高對印度的壓力，中國大陸外交部、國防部、駐印度大使館、新華社、「解放軍報」、「人民日報」等在 8 月 3 日至 4 日間相繼就此事發表強硬措詞的專文或聲明，升高對印度的壓力。舉例而言，新華社文章便稱「中國人向來講究先禮後兵」，「中方把該說的話都說了，已經仁至義盡」，「與中國為敵沒有好下場」；但中國大陸的文攻策略沒有產生預期效果，印度並未就此妥協。

（二）金磚廈門會議的影響

在對峙期間，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曾於 7 月 7 日在 20 國集團（G20）峰會期間進行短暫交談。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爾（Ajit Doval）也在 7 月 27 日赴中國大陸參加金磚（BRICS）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會晤中國大陸國務委員楊潔篪。這些互動顯示雙方並未完全放棄磋商，雙方最終成功透過外交手段解決爭議。印度外交部在 8 月 28 日發出聲明，表示雙方已同意從洞朗撤離。中國大陸外交部旋即也確認印度已從洞朗地區撤回人員，結束長達 72 天的邊境對峙。

雙邊雖未公開談判內容，但此時間點應與金磚國家高峰會議有關。本年度的金磚國家高峰會由中國大陸主辦，於 9 月 3 日至 5 日在廈門舉行，是中國大陸下半年最重要的主場外交活動。如果中印邊界的對峙局面持續，印度可能因此抵制此次峰會。北京在廈門會議的時間壓力下，因而軟化立場與印度進行磋商。印度也在結束對峙的翌日迅速宣布，莫迪總理將參加廈門高峰會，讓北京保住面子。中國大陸則同意印度的要求，在金磚峰會的宣言中首次點名「虔誠軍」（Lashkar-e-Toiba）、「穆罕默德軍」（Jaish-e-Mohammed）等印度認為與巴基斯坦有關的恐怖組織，作為另一項回報，故印度媒體多認為此次峰會是印度的外交勝利。中印領導人也利用廈門峰會進行雙邊會談，強調兩國合作的重要性，企圖修補雙邊關係，但未見具體措施。

（三）對峙事件的後續發展

從雙邊層次來看，中印近來的發展摩擦不斷。今年 5 月，印度拒絕派員參加北京舉辦的「一帶一路」高峰論壇。近期的洞朗對峙則更加深猜忌，勢必影響未來的互動。此次對峙事件雖已落幕，但雙方如果沒有達成具體的約束協議，不排除類似事件將會重演。

從區域層次來看，中印為制衡彼此，將會強化與區域國家的合作關係。印度此次以不丹盟友的形象挑戰中國大陸，多少有助強化它在區域內對其它小國的吸引力及影響力。就中國大陸而言，則會持續布局南亞，包括更積極推動「一帶一路」計畫，強化其區域角色並對印度保持壓力。

中國因素也將推動印、日等國的戰略合作關係。日本安倍首相在對峙

事件後訪問印度，同意協助印度發展東北省分的道路網建設，便被解讀是針對中國大陸而來。因為印度東北地區與中國大陸接壤，雙方對於阿魯納恰爾省（Arunachal Pradesh，中國大陸稱為藏南地區）仍有主權爭議。中國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曾就此強調中印之間的邊界還沒有完全劃定，任何第三方都不應該以任何形式介入中印領土主權爭議。短期內，中印關係將牽動周邊情勢，進入新的盤整期。

五、近期中共軍機在我周邊海域活動之研析

國防大學中共軍事事務研究所所長馬振坤主稿

- 中共軍機於今年 7、8 月份頻繁在臺灣周邊海域活動，並飛出第一島鏈進入臺灣東側西太平洋飛行。
- 中共雖宣稱此為正常訓練活動，惟其戰略意圖應係威懾美軍在第一島鏈內側水域活動，並警告美國莫以朝鮮半島緊張情勢為由升高對中方戰略圍堵，同時藉此對我施壓。

(一) 狀況

今(2017)年 7、8 月份，中共軍機在臺灣周邊海域活動次數頻繁，先是 7 月 13 日共軍「轟 6」轟炸機共 6 架分成兩批出海，飛越宮古海峽向南繞行臺灣防空識別區外緣後，再飛越巴士海峽返回駐地。一周後，7 月 20 日共軍再有 8 架「轟 6」轟炸機、一架「運 8」電戰機及一架「運 8」情報蒐集機飛越東海上空，這是共機首次以南北方向對飛方式繞行臺灣東側海域。我國防部在次(21)日主動對外表示已全程掌握共軍動態，並首度曝光我空軍 IDF 經國號戰機近距離監視警戒中共「轟 6」機的飛行照片。4 天後，7 月 24 日，共軍南部戰區「轟 6」轟炸機 2 批 4 架，於 24 日上午從我國防空識別區南端外緣，飛經巴士海峽進入西太平洋後北上，再穿越日本宮古海峽進入東海飛返原駐地，進行遠海長航訓練活動。我國防部在當日全程掌握共軍軍機動態，並且隨即公布共軍此次環繞我國防空識別區飛行動態。隔(25)日，又有一架共軍「轟 6」轟炸機在中國大陸內陸上空完成飛行訓練後，出海沿臺灣海峽中線以西，由南向北飛行返回駐地。這是共軍「轟 6」機在 6 天內 3 度繞行臺灣周邊空域，也是 7 月份第 4 次繞飛臺灣。我國防部亦在同日公布共軍沿臺海中線以西飛行的消息。

至 8 月，中共軍機又出現頻繁活動的情況。8 月 9 日一架中共「運 8」電戰機自廣東出海穿越巴士海峽後向東北飛行，繞經臺灣東部海域後再向西飛行穿越宮古海峽進入東海後返回駐地。8 月 12 日，兩架「轟 6」轟炸

機、一架「運 8」電戰機，經巴士海峽進入西太平洋後向北繞行臺灣飛行，再穿越宮古海峽進入東海後返回駐地。同日另一批由「空警 200」預警機、俄製「蘇愷 30」戰機編隊，擔任「轟 6」機護航伴飛任務，但於穿越巴士海峽後即循原路線返回中國大陸。8 月 13 日，兩架「運 8」電戰機於飛越巴士海峽後向北繞行臺灣，再向西穿越宮古海峽後飛返駐地。此批「運 8」機在飛越宮古海峽時，並有兩架「蘇愷 30」伴隨護航向西飛行。8 月 14 日再有兩架「運 8」電戰機穿越巴士海峽，其中一架隨即向北飛行至臺灣北方再向西穿越宮古海峽進入東海後返回駐地，另一架則是在穿越巴士海峽後改朝東南飛行，最終折返沿原航線返回駐地。

（二）分析

共軍軍機於 7、8 月份在臺灣周邊海域頻繁出現，尤其是進出宮古海峽、巴士海峽，飛出第一島鏈進入臺灣東側西太平洋飛行，其動機與目的除共軍宣稱之正常訓練活動外，此等軍事活動尚有以下戰略與戰術意涵：

首先，威懾美軍在第一島鏈內側水域之活動，包括美軍偵察機對中國大陸沿海地區之抵近偵察，以及美軍尾隨遼寧艦返航之舉動等。尤其美軍派出神盾級驅逐艦尾隨遼寧艦進入臺海，美軍「EP3」電偵機、「RC135」偵察機也出現在臺海空域，都碰觸到北京當局極力反對美國軍事力量重返臺海之紅線，因此共軍以各型作戰軍機高頻率進出第一島鏈，於西太平洋進行各類作戰演訓，作為對近期美軍機艦在臺海、南海、東海騷擾中方之回應，以期達到威懾之成效。

其次，警告美國莫以朝鮮半島緊張情勢為由，升高對中方戰略圍堵，尤其是對中國大陸沿海之軍事壓力。美國川普總統自 7 月起在朝鮮半島核危機上開始對北京施壓，除公開批評習近平未能盡力施壓平壤當局迫其就範，也開始同意美軍太平洋司令部擬定的對中國大陸沿海進行偵察活動，以及派艦駛入中共南沙人工島礁 12 浬水域範圍內。面對美方逐漸升級之軍事壓力，中共亦採取軍事舉動回應，藉由「轟 6」機穿越第一島鏈，中共展現其空中打擊力量具備對關島實施遠程奔襲作戰之能力，在前述「轟 6」機的遠海長航訓練中，曾出現「轟 6」機在穿越第一島鏈後，仍繼續

向東飛行至冲之鳥礁方才返航的情形。

最後，施壓臺灣以增加對我政府兩岸政策之壓力。蔡英文總統就任至今，因北京當局要求承認「九二共識」及「一中原則」之政治前提，致使兩岸官方交流停滯。過去中共對臺灣採取其所宣稱的「讓利」手段，希望藉由施惠模式，使臺灣民眾漸認同中共，進而支持兩岸交流與最終之和平統一。但讓利政策的結果是愈多臺灣民眾尤其是年輕世代對中共的不認同，這使得北京當局在蔡總統就任後，調整其對臺政策，在官方互動關係上採取堅壁清野的策略，不但不再讓利，反強化其底線思維，將過去隱而不現之政策紅線顯性化。愈趨頻繁之共軍機艦繞臺演訓，亦呈現此一趨勢。